

---

# 跨学研究

---



## 清末民初疫病的符号修辞与叙事机制：以广东三份画报为例

彭 佳 徐欣桐

**摘 要：**“疫病”自古以来多发于潮湿、瘴气较重之地，历史上广东作为疫病多发区，有丰富的有关“疫病”的叙事、文化风俗和治疗措施。笔者将目光聚焦于清末民初广东三份画报：《时事画报》《平民画报》《赏奇画报》，运用符号修辞和叙事学理论，探讨“疫病”内容所运用的修辞框架与背后的叙事机制。

**关键词：**疫病 广东 叙事 修辞

### The Symbolic Rhetoric and Narrative Mechanism of the Epidemic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ree Pictorial Newspapers in Guangdong

Peng Jia, Xu Xintong

**Abstract:** Epidemics have often occurred in places with humid climate and strong miasmas. Guangdong in history, as an epidemic-prone area, has abundant culture and customs, narratives and herapeutic measures related to epidemic.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ree pictorial newspapers of Guangdong which are *Current Affairs Pictorial Newspapers*, *Civilians Pictorial Newspapers*

and *Shangqi Pictorial Newspap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using theories of symbolic rhetoric and narratology to explore the rhetorical framework and the narrative mechanism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the epidemic.

**Keywords:** epidemic; Guangdong; narrative; rhetoric

## 一、引言

近两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人们对疫病的关注度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受此影响，学界也产生了一股疫病研究热。“疫病”大多发于潮湿、瘴气较重之地，清末民初的广东作为疫病多发区，留下了不少有关疫病的叙事、文化风俗和治疗措施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笔者希望通过对清末民初广东疫病话语的分析，从微观上展现传统文化影响下疫病防治的地方话语与治理之术，挖掘地区性疫病防治观念的建构以及其所蕴含的地方性文化逻辑，同时为区域媒介对疫病观念的构建提供修辞叙事的参考。笔者把目光聚焦于广东三份画报，运用符号修辞和叙事学理论，探讨历史上《时事画报》《平民画报》和《赏奇画报》中疫病报道所运用的修辞框架与背后的叙事模式，分析清末民初区域性卫生事业的“地方性”“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叙事机制，从而呈现地区性疫病近代化观念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 二、疫病概念界定

“疫”是中国对疾病的古老称呼，在商代便有记载。在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便标刻着“疰”“疥”“蛊”等字样，这些都是“疫”所囊括的意涵。（张剑光，1998，p.1）除此之外，在岭南地区，“疫”还包括了“瘴”的含义。《魏书·僭晋司马叡传》描述岭南地区为“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瘴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魏收，1974，p.2093）。《后汉书·马援传》写道“出征交阯，土多瘴气”（范晔，1965，p.846），同时，还写到“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其中“瘴疫”可以理解为一种传染性疾病。“瘴”的含义涵盖很广。《广韵》称“瘴，热病”（周祖谟，1960，p.427）。《玉篇》阐述道“瘴，之亮切，瘴症也”（顾野王，陈彭年，1983，p.221）。《岭南医学与文化》梳理关于“瘴”的典故与用语，认为“瘴”有两个含义，其中之一为“闭塞潮湿、致人疾病的自然环境”，二为“与这些自然环境相关的疾病，通常表达为瘴病，若表现为瘟疫则称为瘴疠”（郑洪，2009，p.181）。

随着西医渐入，“疫”有了更加具体的含义。在《中医大辞典》中，“疫”被定义为“具有剧烈流行性、传染性的一类疾病，多因时行疠气从口鼻传入所致”（李经纬等，1995，p.1144）。《疫情旬报》进一步明确“疫”的定义，把11种传染性疾病——霍乱、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疟疾、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脑脊髓炎和鼠疫，归入“疫”的定义中。（张大庆，陈琦，2019，pp.105-106）

本文研究的是疫病防治的修辞与叙事，需要尽可能地挖掘与“疫”相关的话语概念与叙事框架，因此将把上述疫病的相关词并入讨论范围。同时，本文研究的疫病是人际传播的疾病，因此剔除猪瘟、牛瘟、鸡瘟等动物类传染病的报道。综上所述，“疫病”在本文的研究中指具有剧烈流行性、传染性，在人类中传染的一类疾病，即瘧、瘟疫、霍乱、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疟疾、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脑脊髓炎和鼠疫等。

### 三、疫病卫生史综述

早期对疫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学史领域，特点是“以病论病”。学者主要按专题与地域分布对疫病的史料进行整理与考证，以医学史尤其是中医医学史为本体论视角来进行梳理，其中包括对我国古代瘟疫病症的名实考证、古代病名对应研究、现代各种流行病的历史追溯、疫病流行的地方分布等内容进行深入考察与论证分析。余云岫《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对中国古医籍记载的“霍乱病”与弓形菌流行性霍乱进行分析考证，对弓形菌流行性霍乱的传入原因和蔓延地域进行研究（余云岫，1941）。此外，他还对猩红热这一病状做了系统性的论述，其中记载了猩红热的名称、病史、病因、病症以及疗法。对于鼠疫的记载，伍连德做了大量贡献，其《中国之鼠疫病史》囊括了对近代中国的云南、广西、广东、香港、福建、海南等南方地区鼠疫流行情况的记载与考察（伍连德，1936）。“以病论病”阶段的医学史研究在曹树基后开始转型，他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中运用的研究方法是把自然史（包括瘟疫史）、社会史、人文史相结合，在自然灾害的大环境中考察和诠释中国社会变迁，引领医学史走向“多视角跨学科论病”阶段（曹树基，1997）。

随着疫病研究的发展，多视角跨学科论病成为近现代疫病史的研究特点。疫病史的研究逐渐从医学领域走出来，延伸至人口学、社会关系学、统计学等，学者们着力研究疫病与自然、社会、民俗的互动关系，并涉足疫病的防治与现代性的讨论，从横向划分，大致可以分成宏观性研究和区

域性研究。

在宏观性研究中，学者们把疫病相关概念，如“卫生”“洁净”等，与中观层面的城市概况、社会文化、市民心态以及宏观层面的国家性、民族性等概念进行结合分析，从而对疫病文化做更深层的考察。在人口与自然和社会关系角度，李玉尚和曹树基深入调查了近500年的鼠疫情况，呈现鼠疫对中国社会演变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2003）。在疫病的应对措施上，余新忠发现历代封建王朝多以仁政和德治作为出发点对百姓进行救治，因而并没有对疫病防治形成系统性的认识，且在切断疫病传播方面贡献较少（余新忠，2020）。在疫病概念的演变角度上，何小莲发现，历史上西学卫生概念的“出场”与传教士有关，他们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改善公共卫生的建议，通过医院、报刊传播有关接种牛痘，预防霍乱、天花、鼠疫等传染病的知识，多方呼吁中国注意公共卫生问题（何小莲，2003）。在西学传播上，陈小卡指出，19世纪初，中国接种牛痘的开展，是我国接受西式防疫抗疫的开端（陈小卡，2020，p.511）。伴随着西学概念“合法化”过程的推进，中国传统的医学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台湾学者梁其姿在《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中，描述了近代中医学知识体系在西学冲击下所受的挤压，其中一些著名的中医学者，例如丁福保和陈邦贤等，一方面极力维护中医的精粹，另一方面主动引入西方科学中的卫生体制和医疗方法，以推动中医的“现代化”（梁其姿，2011）。西学概念“合法化”的背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融合。外国学者罗果斯基（Ruth Rogaski）通过解析中国“卫生”含义翻译的扩展，发现“卫生”在清末之前指的是中医的“保健之道”，但在帝国主义入侵后，卫生的意义外延扩展至科学进步、清洁、健康等意义，换言之，中国传统的“卫生”概念由原来的“保健观”向“清洁观”延伸，意义领域也从私人向社区转型（Ruth Rogaski，2004）。

在区域性研究上，西学渐入的次序也影响着学者们对疫病研究地的选择。西方医学概念主要从东南沿海口岸，如珠江口的澳门、广州一线传入，再经各个口岸向全国传播（陈小卡，2020，p.2）。因此在区域研究中，学者主要集中于对港口城市如广州、澳门、香港、天津、上海的研究，同时也针对疫病多发地域，如岭南地区、江南地区等进行考察。李玉尚利用福建、云南、广东地方史料和地方卫生部门报告中的细致描写，在中医疗法以及民国期间民众与官方的防御举措方面深化了对鼠疫的研究（李玉尚，2002）。余新忠从近代市民社会研究切入古代疫病史研究，对清代江南地区疫情做了较深入全面的资料调查、流行个案分析和整体规律研究，尤其是说明了瘟疫流行的后

果和社会对它的控制（余新忠，2003）。在广州地域研究上，《岭南瘟疫史》是综合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此书结合医学史和相关社会因素，从岭南瘟疫资料的整理，到社会应对瘟疫的措施与瘟疫对社会的冲击都进行了研究与总结（赖文，李永宸等，2004）。对广州地区疫病进行研究的文章数量并不多，多数学者从“卫生”概念入手，探讨广州公共卫生的现代性。如潘淑华从“秽处”着手，考察广州20年的厕所和粪秽管理改革，发现改革虽没有给广州城市环境卫生带来质的变化，却使广州市民建立起近代公共卫生观念、文化与生活追求（潘淑华，2008）。赵文青着眼于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通过机构的设置、制度的厘定、人员的配备、经费的筹拨以及具体的治理等多个纬度对广州城市卫生进行考察，分析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工作中的不足（赵文青，2007）。周瑞坤则从政权与卫生关系切入讨论，发现广州卫生局的卫生政策实施对广州当地、广州市民有着现代性的推动，同时也对政权的塑造有重要的影响（周瑞坤，2002）。

通过对疫病史研究的梳理，我们发现，疫病史研究从一般的材料收集与材料考证，到结合各类学科，从人口、地域、自然等维度，对社会价值与文化层面进行深入的挖掘分析。研究多数以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作为主题，勾连有关地区的社会状况以及文化逻辑，分析地方性近代知识生产。广东属于这类区域研究中的热门地点，但多数文章都是从现代卫生的角度出发，因此从“疫病”这一角度研究近代广东社会，有一定的延展意义。此外，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政府层面，多数以县志、法律规定等官方材料作为研究对象，涉及民间以及社会材料如报刊、日志、小说的研究较少，因而研究结论多以呈现政府认知为主，而关于民间对疫病的直观认知的呈现则较为缺乏。实际上由社会各阶层如民族企业家、普通百姓等所构成的民间疫病认知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 四、传统认知局限下的“病恶相连”观

通过深入分析历史上广东有关画报内容，我们发现，清末民初对疫病的态度的构建主要体现在对疫病的修辞和叙事上。在清末民初的画报内容中，受传统民间知识及观念的局限，“病”与“恶”构成隐喻，产生负面价值的感情色彩。

在具体的叙事上，当时的报道内容多以对疾病进行“驱赶”“消除”为主，如《时事画报》1906年第12期《岑督实行防疫政策》和《时事画报》1906年第4期《卫生适以伤生》等，对疫病均持一种远离和驱赶态度。“疫

病”作为一个符号，虽然能被科学剖析与拆解，在医学领域呈现中性意义，但在我国传统民间认知中，“疫病”却是一个具有负面价值倾向的词语。清末民初民间对疫病负面态度的建构，既受外来疫病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罚”观念的吸收，同时也受自身传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对传统“病文化”思想的承接。

在西方传统文化语境下，“疫病”概念常与道德和宗教相结合。鼠疫第一次暴发的时候，西方人无法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便把瘟疫视为上帝的愤怒，认为瘟疫是由人类自身的过错与罪孽导致的。（张大庆，陈琦，2019，pp. 105-106）这种观念也较多地反映在了“瘟疫文学”作品中，丹尼尔·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写道：“我要提醒世人，碰上瘟疫时仍要对上帝保持敬畏之心。”（笛福，2013，p. 289）书中把瘟疫的暴发归因为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以一种“神意卫生”观（迪克森怀，2012）构建“瘟疫”概念，使“瘟疫”与“神罚”“罪”等负面的意涵相连，使“上帝对世界罪行的判罚与救赎”成为“疫病”的所指对象。

在东方传统文化语境下，“病”一般与“恶”“坏”等带有负面价值判断的词语勾连，“病”概念的构建，常与人情伦理、命运轮回、社会征兆等结合，多被赋予超自然色彩，带有神话意味和迷信色彩。如《搜神记》第九卷写道：“昔苏峻事公，于白石祠中祈福，许赛其牛。从来未解。故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sup>①</sup>小说把庾亮的病归咎于鬼神。基于对传统“病文化”思想价值的承接，“疫病”观念同样受“神意卫生”观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小孩若患天花，人们会认为是天神对小孩的惩罚，便会去拜祭“麻姑娘娘”或“花姑娘娘”，以望消除病痛。（何小莲，2006，p. 167）正是受自身传统“病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与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融合，清末民初针对“疫病”形成了“病恶相连”的观念。

“病恶相连”观及“神意卫生”观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卫生观，其本质是封建统治者企图对民众身体进行借用，使民众身体政治化，目的是巩固其封建统治。因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病恶相连”观及“神意卫生”观受到了质疑与否认。如《时事画报》1906年第6期《何不讲求卫生》一文叙述了佛山地区的“迎神舞狮”祛除疫病的热闹场景，同时也告知仪式过后依旧有“疫病患者暴毙”的现状。叙事运用对比的修辞方式，烘托出了清末民初百姓的无知和“靠神祛病”的无效。

<sup>①</sup> 详见《搜神记》第九卷。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81900&remap-gb>.



图1 《时事画报·何不讲求卫生》

然而，清末民初尽管知识阶层在叙事中已透露出对西方传入的现代“卫生”概念的接受，把封建迷信活动视为标出项，但百姓对“卫生”概念反响较小，超自然意义解释下的“疫病”观很长一段时间依旧存在，一些封建迷信的去疫病活动依旧盛行，如“迎神舞狮”“瘟神游行”<sup>①</sup>“破除风水之害房屋”<sup>②</sup>等。纵使民间百姓对“卫生”概念并不接纳，但政府仍把“卫生”概念置于日常管理的政策之下，从行动上给予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时事画报》1906年第12期《岑督实行防疫政策》一文写道：“凡有死丧之家，无论是否疫症，均不得将死者衣物在街巷及宅内焚化，以免秽气传播。并由局一体出示，仍将城厢内外各处毙命之人，如何病由，逐日查明呈报。并由县谕饰善堂绅董，赶紧多催人夫，随时收死者衣物送往石房焚烧，将灰埋藏地下，以免传染云。”可见，“卫生”这一概念在权力运作下被民众接受，其合理化的过程亦是人们受到规训的过程。疫病防治中的“卫生”概念，其实是媒体与政府共同构建的，在人们内心无声地表达着，同时又以身体运动的形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有形地渗透着。

① 详见《时事画报·澳门怪状》，1909年第9期。

② 详见《时事画报·风水之害》，1907年第2期。



图2 《时事画报·岑督实行防疫政策》

综上所述，在清末民初的画报内容上，“疫病”观因传统认知的局限，呈现出“病恶相连”的叙事特色。作为封建迷信的“病恶相连”观与“神意卫生”观相互勾连，其实是对中国传统的“疾病”迷信思想的延续，以及对西方传统“瘟疫”隐喻思想的选择性融合。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民智的开启，它们都已逐渐被世人抛弃，这个过程正伴随着疫病防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 五、中医话语框架下的“西药中论”

来自西方的“疫病防治”概念，除了涵盖“卫生”“检疫”等预防和治理措施，背后还有一套以细菌学为中心的西医病理解释体系。清末民初以后，在公共卫生领域，不仅西方“疫病防治”概念在政府的治理措施上逐渐找到了合法化途径，而且西医病理解释体系还通过“药品”这一媒介逐渐渗透进百姓生活中。

据统计，1911年以前，岭南地区共发生鼠疫超过500次，从1905年至1911年这6年时间，每年基本都有发生鼠疫的记录。（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1965，p.572）应市场需求，大量西药被引进或制造。为与中医争夺市场，大量西药在报刊上登广告，提高曝光度与知名度。



较为出名的疫病治疗药有“三蛇胆药油”<sup>①</sup>“万应保济丸”<sup>②</sup>“去火午时丹”<sup>③</sup>“核症护心散”<sup>④</sup>“时症药水”<sup>⑤</sup>“朱中兴普济药水”<sup>⑥</sup>等。过去岭南经常被冠以“瘴乡”的称谓，文学作品中，以《全宋诗》为例，涉及岭南“瘴”意象的词汇共出现 343 次（侯艳，2014）。同时《外台秘要》又引《备急》写道：“夫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别有异病。”（李佳琪，2020）。因此，清末民初广东画报上药品广告多表明具有治“瘟疫”“瘴气”“疟疾”的疗效。虽然这些药品大多是西药，但是在命名和描述其功效的时候，却往往借助中医的话语框架来完成传播任务，以减少传播隔阂。

不同于今天市面上售卖的西药直截了当使用化学成分命名，如“头孢丙烯片”，清末民初时西药的出场与劝服借助的是中医的话语框架以及地方的语言习惯。如“去火午时丹”的命名借用的是中医的“火”概念。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火”的概念被广泛运用，“少火”“君火”“命门之火”用于陈述人体生理功能，“壮火”“火证”“火邪”则用于说明人体病因病机（刘惠金，贾春华，2012）。实际上，中医“火”的概念是把现实生活中具象的“火”通过隐喻映射为生理上抽象的“病痛”，但经过时间的沉淀，该隐喻已成为中医里的一个规约符，意涵为“身体存在病状”。“去火午时丹”的“去火”是“去除身体病痛”的隐喻，进而转喻该药的祛病功效；“保济”“普济”“护心”等概念也皆是中医话语。

药品功效的宣传既处于中医话语框架下，同时还结合地方语言特点进行表达。例如，“梁培基发冷丸”在广东建厂，年销量达到 100 万瓶，且远销美国和东南亚地区。（陈小卡，2020，p. 240）其广告写道：“一服即全愈，包你有再制”“冇件系等驶”（没有见效的），运用顺口溜和粤讴进行文案的写作。梁培基认为“宣传要通俗，才容易深入人心，同时要避免流于那种江湖卖药的庸俗口吻”（陈小卡，2020，pp. 240-241）。相似功效的药品还有安泰大药房的“专制发冷驱魔丸”，其广告以短句为主，四字对仗，朗朗上口，运用白话“平安”“断尾”等词语，带有浓厚的地方气息：

① 详见《时事画报（第九册）1905（01）—1913（12）》，第 316 页。

② 详见《时事画报（第九册）1905（01）—1913（12）》，第 292 页。

③ 详见《时事画报（第九册）1905（01）—1913（12）》，第 558 页。

④ 详见《时事画报（第九册）1905（01）—1913（12）》，第 85 页。

⑤ 详见《时事画报（第九册）1905（01）—1913（12）》，第 128 页。

⑥ 详见《时事画报（第九册）1905（01）—1913（12）》，第 128 页。

症症为患，不外积痰，感冒风热，触动邪寒，乍冷乍热，应期回还，日久不愈，血气难担。泰安此药，功盖入寰，立能止病，再不重番，一服断尾，永保平安。<sup>①</sup>



图3 《时事画报》泰安大药房广告图

除此之外，隐喻、夸张等修辞手法被广泛运用，且行文带有玄幻和传奇色彩。如以“奇药”“功盖入寰”来描述药品的性质，尤其是“专制发冷驱魔丸”广告词写道“立能止病，再不重番，一服断尾，永保平安”，以夸张的语气给该药附上神奇的色彩。这些广告的共同特点是并不说明用量，只是单方面夸赞药品的功效广、疗效短。

总之，通过梳理疫病治疗药品广告，我们发现，清末民初时西药大多是借用中医的话语体系出场，以“中医话语”表达“西医配方”的内核，这一方面是利于吸引易于接受西药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利于劝服认为“外国之药，其名既异，其性复殊，而且研磨炼水，更无从而知其形”（杨米人，

<sup>①</sup> 详见《时事画报（第九册）1905（01）—1913（12）》，第197页。

1982, p.126) 的保守群体, 目的是让更多的国人尝试以西药治病。由于当时百姓大多仍持“知其药之良, 而不敢服, 诚恐服之有误而无术以救正之”(杨米人, 1982, p.126) 的保守心态, 因而西药在广告词上脱离不了以“中药之理”论“西药之效”的言说方式, 同时还常辅以一种夸张的叙事方式以凸显药物功效。这种营销方法, 侧面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民间传播西方疫病防治概念的巧妙之处。

## 六、总结：“疫病”概念出场的多重语义

何小莲表示“西医东渐, 取自下而上的路径”(何小莲, 2006, p.7)。清末民初以后对西方疫病防治概念的引入与接受, 这一过程的轨迹脉络可从民间报刊中寻得。从当时的画报内容可见, 民间话语注重对疫病的“治”与“评”, 关注疫病的治疗方法与治疗手段, 其“疫病”观念的构建, 在符号修辞与叙事机制上有两个特点: 传统认知局限下的“病恶相连”观的形成; “西药中论”, 即有关疫病治疗的药品广告常借助中医话语概念。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语境下, “疫病”符号与传统思想、西医理论、中医观念勾连, 形成了诸如“天神发怒, 降下灾难”“不讲卫生导致的病”“上火、触动邪寒”等叙述形式。当时“疫病”概念的构成, 多受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 但西方的观念也逐渐融入社会, 并多以报刊内容的形式出场, 以中医话语为框架, 以西药为形式进入民间生活, 同时通过官方的防疫措施获得了合法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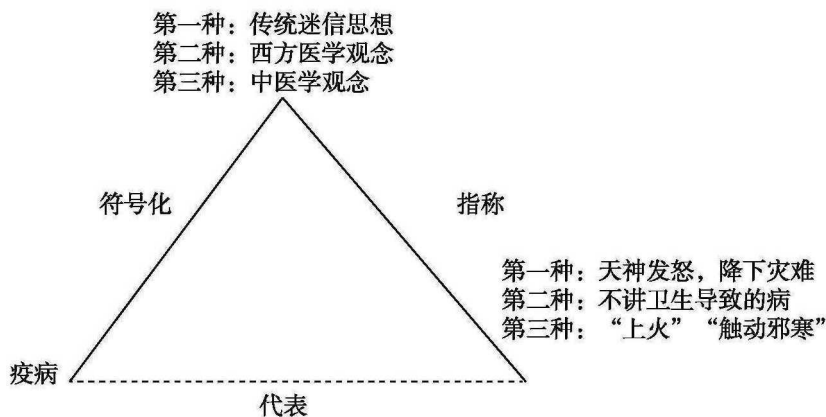


图4 “疫病防治”概念本土化语义分析图

那个时期, 虽然官府给了西方“疫病”概念出场的合法化路径, 但是总体来说该概念的建构与理解是自下而上的, 其中民间的报人与商人是西方

“疫病”概念出场的有力推动者。民间的报人利用直观的图画以及风趣的文字呈现“卫生”行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有利于让民众逐渐接受“卫生”概念。同时，广东的实业家销售、生产西药，以中医理论进行宣传与劝服，让西药进入民众的生活中，通过治疗效果使民众逐渐理解融合了西医理念的疫病防治方式。

总之，清末民初随着一系列近代化运动的开展，西方“疫病”概念逐渐融入中国文化语境，作为愚昧和迷信产物的所谓“病恶相连”观及“神意卫生”观逐渐成为标出项，新的“卫生”概念逐渐融入中国“疾病”防治的话语体系。

引用文献：

- 曹树基（1997）. 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历史研究，1，16.
- 陈小卡（2020）. 西方医学传入中古史.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笛福，丹尼尔（2013）. 瘟疫年记事（许志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迪克森怀特，安德鲁（2012）. 科学—神学论战史（鲁旭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范晔（1965）. 后汉书（第3册）. 北京：中华书局.
- 顾野王，陈彭年（1983）. 宋本玉篇. 北京：中国书店.
- 何小莲（2003）. 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学术月刊，2，7.
- 何小莲（2006）. 西医东渐与文化适应.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侯艳（2014）. 唐宋历史地理与诗歌地理中的岭南. 广西社会科学，11，6.
- 赖文，李永宸等，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2004）. 岭南瘟疫史.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李佳琪（2020）. 市井与医疗：《时事画报》医药广告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
- 李经纬，余瀛鳌，欧永欣等（1995）. 中医大辞典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李玉尚，曹树基（2003）. 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 中华医史杂志，33（2），5.
- 李玉尚（2002）. 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 中华医史杂志，32（3），6.
- 梁其姿（2011）. 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刘惠金，贾春华（2012）. 从隐喻认知角度探究中医之“火”的概念内涵.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5，2087—2091.
- 潘淑华（2008）. 民国时期广州的粪秽处理与城市生活.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9，67—91.
- 桑塔格，苏珊（2003）. 疾病的隐喻（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魏收（1974）. 魏书. 北京：中华书局.
- 伍连德（1936）. 中国之鼠疫病史. 中华医学杂志，22（11），1039—1055.

- 杨米人 (1982). 清代北京竹枝词 (十三种).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 余新忠 (2003).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余新忠 (2020). 中国历代疫病应对的特征与内在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8, 2.
- 余云岫 (1941). 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 中华医学杂志, 29 (6), 273-278.
- 张大庆, 陈琦 (2019). 近代西医技术的引入和传播.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张剑光 (1998). 三千年疫情.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 赵文青 (2007). 民国时期广州城市环境卫生治理述论. 博士学位论文. 广州: 暨南大学.
- 郑洪 (2009). 岭南医学与文化.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 (1965). 林则徐集奏稿. 北京: 中华书局.
- 周瑞坤 (2002). 公共卫生与广州城市现代化 (1901-1930). 博士学位论文. 台北: 政治大学.
- 周祖谟 (1960). 广韵校本. 北京: 中华书局.
- Ruth, R. (2004). *Hygienic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作者简介:**

彭佳,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教授, 研究方向为符号学。

徐欣桐,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符号学。

**Author:**

Peng Jia,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s focused on semiotics.

E-mail: pj8024@163.com

Xu Xingtong, M. A.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s focused on semiotics.

E-mail: 61910054@qq.com